

目 录

铁骨铮铮，不畏强暴

- 爱国志士孔庆尧……………王奉三（1）
为抗联送军粮……………刘 捷（8）
给抗联拉道……………刘 捷（11）
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

- 老黑顶子肉丘坟……………付亚东（17）
冯占海在五常抗日活动片断……………李茂森 王奉三（21）
小山子战斗……………郎国兴 钱忠民（29）
难忘的一九四五年……………李子斌（34）

- （一）回忆八家子战斗
（二）回忆张家油坊战斗
（三）回忆张家塘坊战斗
（四）活捉叛徒于长海

- 匪首刘国良就擒记……………李茂森（46）
伪商会长朱福三……………陈维谦 郎国兴（51）
披着佛教外衣的女特务——刘沿航……………王青春（59）
伪满时期的五常县学校教育……………肖君山（65）
拉林地区满族的由来……………郎国兴（75）

铁骨铮铮 不畏强暴

——爱国志士孔庆尧

王奉三

解放前，正阳县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孔庆尧，在任职期间，铁骨铮铮，不畏强暴，为伸张民族大义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事迹。

1942年1月，孔庆尧调来正阳县国民高等学校任校长。国民高等学校当时每天都要在操场举行朝会，按照惯例，校长要登台讲话，台下的师生都要向校长施举手礼。孔庆尧到校的第一天，朝会上他看到台下全体师生都向他举手致礼，唯有日本人主事（相当于副校长）高傲地站着，若无其事。孔校长立刻变色，他的目光炯炯，直扫那个日本人，带着训斥的口吻说：“我是校长，你是主事，也得给我行礼！”从此，日本人主事每天朝会和台下的师生一样给校长敬礼。学生都说：“新来的校长不简单，敢管日本人！”

学校设军事课，每到这节课，教官蔡雁序少校在操场上给学生教授投弹、刺杀等军事科目，往往延长时间，放学铃响了，仍不收操。孔校长发现后，来到操场，用手势把教官叫到面前，很严肃地说：“时间到了，赶快收操，以后不许压堂！”果然，以后军事课，不再延长时间了。学生中间又议论开了，有的还竖起大拇指说：“新来的校长是好样的，敢管军事教官！”以前，学校的事情都是主事（日本人）说了

算。孔庆尧来后不当傀儡校长，说话算数，并且敢做敢当。

依照伪满教育规定，“国民道德”课要由校长承担，孔校长在讲这门课程时，并不照本宣讲，而是讲些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”等古今典型事例，潜移默化地向学生灌输发奋自强的爱国主义思想。他教育学生要有志向，发愤读书，将来成为栋梁之材。在“学成治国”的思想指导下，他对那些学习上孜孜以求的同学，格外钟爱；而对那些惰于学习，徒混学历的学生则恨铁不成钢。他时常打比方说：“如果学无所成，就将是‘剃头匠拍巴掌，又完（蛋）一个’！”孔庆尧憎恨日本侵略者，不甘当亡国奴，胸中燃起的忿怒之火，时有表露。有一次在给学生讲“国民道德”课时，当讲到“日满亲善”时，他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什么‘一德一心’，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！”讲到皇军“武运长久”时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什么他妈‘武运长久’，纯粹是穷兵黩武！”这掷地有声的语言，一针见血地揭穿了“日满亲善”、“王道乐土”的谎言。学生听了后无不惊讶，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。课后，教室里互相交耳议论，都说：“孔校长不畏强权，敢吐真言，胆量真大！”

孔庆尧热心教育事业，极力培养青年一代的自强心，他自己也做了自强的表率。他来校不久，听说学生的“配给品”，有关部门迟迟不给。他气愤地给配给部门打电话：

“满洲国给学生的配给品，你们为什么不给？你们查一查，是谁给扣压了？……”那个部门被质问得无话可答，没等学校去取，就把“水袜子”（后开口胶鞋）等配给品用马车给学校送来了。以前，县里举行篮球赛，国高队往往败北，孔校长来后，校队练球时亲自到球场指导，并且提出“稳”（接

球）、“准”（投球）、“狠”（夺球）的三字要领。经过精心指导，球技迅速提高，参加县篮球赛时，他亲自带队。比赛中，校队每场必胜。正在此时，对方球风恶劣，踢伤校队队员，场上出现风波。孔校长目睹此情，挺身而出，健步上场，手举文明棍，断然决定：“国高球队弃权！”就整队退出球场返校，球赛到此中止。后经球赛负责人到校检讨，苦苦要求，校队才二次到场，使球赛继续进行。此事曾一时轰动五常县城。

孔庆尧憎恨日本侵略者，更恨那些出卖灵魂的汉奸。有一天夜里，一个姓周的学生从山河屯回来，下火车走到西门警察分驻所时，一名警察以检查“国民身份证”为由，把这名学生扣留。周说：“有身份证，没带在身上，我是国高学生，有帽徽为证。”警察故意刁难，执拗不放，周在气愤之下打了警察，把警察的眼镜也打碎了。翌日早，警务科给孔校长打电话说：“昨晚，你的学生把警察打了，你知道不？”孔庆尧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好啊，打了‘皇帝陛下的警察可不一般，”接着又说：“不会吧，国高学生打警察多不体面，你们看错人了吧？”在他的搪塞之下，打警察的事不了了之。以后，警察见了国高学生，不敢再放肆，如果和学生走个对面，警察首先让路。尽管这样，学生戏弄警察之事，仍时有发生。孔校长平时最讨厌警察，一提到警察，他就说“警察狗子”。因为孔校长鄙视警察，伪满五常国高学生毕业后，没有一个报考警官学校的。

孔到五常前，国高有一名姓陈的学生突然失踪。后来知道是被伪满当局以“反满抗日”之嫌抓走的。孔来后，赶上几名同学正议论此事，他听了以后，当即发泄不满地说：

“那是抓猪呀，说抓就抓，要抓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！”他对那些不忘民族气节的人寄予深切的同情。

孔庆尧对敌人冷若霜剑，而对学生却十分关怀和爱护。他时常在课余时间，深入学生宿舍，了解生活情况。他看到学生吃的全是高粱米，把家里的一袋大米打发人送来，给学生改善伙食。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，他常讲些古人刻苦读书的事迹，鼓舞学生克服困难，发愤求学。

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，各界人士赞颂的中学校长，来后仅半年时间，于6月的一天夜里被日本宪兵秘密抓走了。直到解放后，才知道孔庆尧在监狱里，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，他都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。敌人每次过堂时，他什么也不招认，并大骂不止，竟被敌人打瞎了一只眼睛。最后在绝食斗争中死于哈尔滨道外监狱，时年36岁。

孔庆尧在五常的事迹，仅是对他敌斗争的一个侧面。是什么使他敢于和凶恶的敌人作对，直至临危不惧，英勇就义呢？

孔庆尧1907年生于巴彦县孔大屯，念完小学考入绥化师范。三年毕业后，回本县西集小学当教员。1927年考入东省特区二中师范科进修。1928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斗争中，孔庆尧被推举为学生代表，领导同学参加全市学生游行队伍。这次游行，大、中学校学生约两千人，规模较大。孔庆尧和另两名学生代表手持小旗，高呼口号，表现非常积极。在这次斗争中，孔庆尧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同志，开始受到革命教育，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。第三次游行示威时，他表现得更加突出。当局惶恐，急忙出动军警，双方发生了冲突，军警开枪，学生以

拳头和石块回击，许多学生受伤，孔庆尧也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两次反帝斗争，孔庆尧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，是中国不能独立，不能繁荣富强的根本所在。只有驱逐外国侵略者，打倒封建势力，祖国才能振兴。从此，他逐渐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。1929年毕业后回县从事教育工作，任中学教务长。在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支配下，拟在中学开办师范班，培养师资，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。但是，由于缺少经费，这个愿望没有实现。翌年，他任校长后，仍然筹划办起师范班。为了解决经费，一天，他在当时很有名气的华丰居饭店，宴请八大家商号经理，提出募捐兴办师范一事。各商家都很支持，唯独德兴隆经理迟克勋反对。孔庆尧的办学热忱正在方兴之时，哪里忍受得了，一气之下抡起手杖把迟经理打到饭桌下面去了。素有名气的迟二东家怎肯吃下这个亏，扬言要去省里告状，后经人劝阻了事，但从此，他对孔庆尧耿耿于怀，伺机报复。

1930年，孔用募捐的钱，在中学办起一个师范班，热心为家乡培养师资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犯，军阀、汉奸的纷纷投敌，使他逐渐认识到“教育救国”之路行不通，于是产生了武装斗争的念头。他费了很多周折弄到一些枪支，准备在学生中进行军训，上前线打日本鬼子。但是，学生家长怕事，不让子女去校，结果计划落空。从这件事上，孔庆尧觉得：这仍然是个思想教育问题。从此，他讲“修身”课时，有针对性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，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。

1932年4月，巴彦县的张甲洲（北大学生）从北平回来组织抗日游击队时，孔庆尧也组织了六十余人的抗日队伍，

张任总司令，孔任宣传部长。东兴战役后，孔回家探亲时，母亲百般阻拦，不让他回队，他对母亲说：“言必行，行必果，不能离队。”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张甲洲想出个好办法，叫他借机潜入地下，开展敌后工作。孔庆尧留在家乡以后，便去双鸭山西程福屯，到程县长家去避难，佯称他在游击队不干了，张甲洲要捉他。程县长在县里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解除疑虑，便又派他到中学当校长。

孔庆尧隐蔽下来以后，那个在华丰居挨打的迟克勋（后为协和会长）耿耿于怀，时刻想要乘机对孔进行报复。他有机会就向日本人说孔庆尧的坏话；加之，孔的一些言行确有“不规”之处，因此，日本鬼子和警察、特务把他列为“赤化分子”予以监视。赵尚志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想出一个解脱的办法。1935年夏的一天，赵尚志带领少年连来到孔大屯，他和孔庆尧的母亲耳语了片刻，孔母点点头，便叫家人把贵重东西从屋子拿出来。这时，赵尚志扬言孔庆尧逃离游击队，是“革命叛徒”我们来烧他家房子，以示惩罚。孔家的房子被抗日游击队烧了以后，县警察署长和几个日本鬼子特意到孔大屯看了现场，相信这是真的，从此，解除了对孔的怀疑。

孔庆尧以中学校长的合法身分，开展地下工作，抓住有利时机，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公开教育学生毕业后不当警察狗子，支持学生打警察，他顶撞汉奸伪县长，斥骂虐待学生的鬼子教师。当时，警察把巴彦国高称“孔家大院”，即指这里不服“天朝”管，是校长孔庆尧的天下。

巴彦中学，由校长孔庆尧从外地请来数名教师，后都因被通缉而出走，据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人。孔庆尧结交的人，有个叫铃木贯太郎的日本人，是巴彦县伪协和会事务长。

1940年国高学生毕业时，孔庆尧请他参加毕业典礼。铃木讲话，在黑板上写了“孔门十哲颜渊，后来成为贤人”等语，他并作解释说：“人要有信念和报负，不论经受多少挫折，也要矢志不渝，只要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，理想就能实现。”铃木还说：“资产阶级不管怎么凶狂，迟早要灭亡，无产阶级必定胜利。”讲话完了，还让翻译叮嘱大家：听了讲话以后，心里明白就行了，不要往外讲。以后不久，这个铃木被日本宪兵抄家，翻出不少日本共产党的书刊、文件，将他抓到哈尔滨，后来下落不明。

孔庆尧这位坚强的爱国志士，敌人对他既害怕，又不放心，于是来个“调虎离山计”，把他调来五常，然后为他罗织罪名，暗下毒手。

为抗联送军粮

刘 捷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后，在敌伪统治最严密的情况下，为了不断打击敌人、消灭日寇，战斗在尚志、五常县的我抗联十军汪亚臣军长，亲自率领战士下山，动员群众给抗联筹集给养。

那是1937年（康德四年）旧历2月间，山区的积雪还没化净，一天晚上，冲河镇的五里四屯，人们刚点上灯，就听外面狗咬，大家都警惕起来，防备土匪突然袭击，进屯子绑票抢东西。养马人家都把马藏起来，有的链到一起，等听到动静就往外跑。就在这时，抗联十军汪亚臣军长率领五、六十名战士，由山下来，从东门和屯子南面进入冲河镇管辖的五里四屯。

当时，这屯仅有四十几户人家，还有几家是“跑腿子”户，他们都是被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撵到这里归屯并户的。以前，这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汪亚臣的“双龙队”是抗日的队伍。由于抗联战士经常活动在山里，并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所以，人们看到抗联战士都非常亲热，问寒问暖。帮他们缝补衣服，给他们送粮食、蔬菜，为抗联战士解决生活的困难。

这天晚上，抗联战士进村后，家家户户都为他们烧水、做饭，给抗联战士筹备给养。汪亚臣军长带领战士刚进屯，

从北城子来了三名自卫团员，到五里四屯查夜。还没进屯，就被抗联的岗哨发现，问他们：“谁！到这儿干什么？”他们回答是奉命来查夜的。当时，抗联战士佯称是他们的同僚，是公司屯的自卫团，也是来查夜的，并要和他们配合起来。那三个自卫团兵信以为真，没加任何防备。其中卢清海、庞永生二人大摇大摆地刚一进城门，就被抗联战士俘获，缴了他们的枪。那个叫邓云秀的发现自己的两个弟兄被俘，一看势头不对，撒腿就跑，想回去报告，被抗联战士一枪打伤，他趴在地上直哎呀，抗联战士命令他“不许动，不许出声！”

为了争取时间，抗联战士吃饭时，全屯人就忙着给他们筹集粮食。汪亚臣军长和几名战士在老赵家吃饭时，赵大嫂亲切地说：“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你们了，今天在我家吃点便饭吧！”汪亚臣将军一边吃饭还一边向他们全家人宣传抗日救国。

筹集粮食时，家家都是有啥粮就往外拿啥粮。孔庆禄家的粮食不多，可他们全家一定要给抗联战士一些粮。他说：“不够吃，我能借，你们在深山老林里上哪去借呀！”周子龙父亲把仅有的一小缸小米，也给抗联战士装在布口袋里。对面屋的一位妇女拿出三包火柴给抗联战士，并说：“拿着吧，好~~引~~火取暖，在山里断火不行啊！”只一小时多点，全屯群众就给抗联战士筹集三、四千斤粮食。大家一看抗联战士自己背不了，立刻套马爬犁送。还有二十多名群众和抓来的那两个自卫团员也跟着一起背粮。出屯一里多路时，公司屯自卫团薛振邦、金玉廷带领队伍迎面而来，他们从远处看到抗联战士和群众在一起，浩浩荡荡，不敢正面

迎战。于是他们拐到小河沿，在河坎子底下乱放枪，企图堵击抗联战士运粮。汪亚臣军长为防止战斗打响了拖延时间，误了大事，又耽心背粮群众受害，让群众放下粮食，赶快散开，隐蔽起来，群众坚决不肯，背着粮食跑步上山。汪军长率领战士掩护，等甩掉自卫团追击时，群众已把粮食运到三家子山口处。这次运粮很顺利，只有一名战士负了伤。

快要进入深山了，军长汪亚臣代表全体战士谢别了群众，并表示：一定早日消灭日寇，收复祖国河山。并把抓去的两名自卫团员也放了回来，当众教育他们：不要当日伪走狗，欺压百姓干坏事，要有民族良心，为抗日救国出力。这两名自卫团员连连点头说是！是！是！于是，汪亚臣军长率领战士胜利地返回根据地一一九十五顶山，又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给抗联拉道

刘捷

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，为了加紧其反动统治，推行所谓“治安肃正”实行了“归屯并户”，在山区集镇驻扎日、伪军和讨伐队，封锁山区要道妄图割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。而活动在我县的抗日联军依靠群众，不断打击敌人，使日寇闻风丧胆。

抗联十军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打击敌人反动气焰，鼓舞军民抗日救国斗志，经常活动在冲河四平山一带，与敌人周旋。1937年（康德4年）夏季的一天，抗联十军两名战士侦察敌情，他俩来到小黑河屯西北河套，看见该屯的老百姓杨禄正在河沿钓鱼，便走到近前问：“钓多少了？”杨禄说：“今天还行，有三、四斤吧。”又问：“你经常钓鱼吗？”杨禄说：“我种的地在这跟前，有空我就钓。”那两名抗联战士和老杨对个火，抽袋烟就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杨禄心想：这两个人是哪的呢？怎么不认识呢？莫非是土匪，若是土匪也不能这样文明呀，八成是抗联吧？

时隔一天，两名抗联战士侦察情况回来，看见杨禄又在钓鱼，没等搭话，一眼就被老杨认出来，其中有一个战士前天曾和他对火抽烟。杨禄问道：“你们干啥活呢？”抗联战士回答：“我们是在河里放排木的，火柴湿了，来到这要几根火柴好做饭。”于是杨把半盒火柴给他们了。过了几

天，杨禄在河边钓鱼，又碰上三名抗联战士。他从心里纳闷：以往在河沿钓鱼，一个人也看不见，这些日子怎么隔两天就遇上有人呢？想来想去，总是疑惑。虽然不知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但他断定不是土匪，也不是密探。由于接触的次数多了，这几名抗联战士便毫不戒备地向老杨打听冲河街里的情况。杨禄说：“街里驻有日本讨伐队，有伪军、森林警察队，还有警察署、自卫团。这些天风声可紧了，随便出入城门都不行，得搜身检查，出事就抓嫌疑分子，没要紧的事，屯里人谁也不上街，都怕招来麻烦”。一位抗联战士说：“我们放木排把火柴和盐都用没了，想托你上街给买点火柴和食盐，行吗？”老杨说：“买这点玩艺不用上街，我家都有，就是上街，没有配给账也买不出来”。第二天，杨禄从家拿来五盒火柴和一碗食盐，交给了抗联战士。战士们一定要给钱，老杨说啥也没收，并说：“人在外边哪有背房子地的，这几盒火柴算个啥！”

就这样，抗联战士先后与杨禄接触六、七次，他们了解到老杨确实是穷苦老百姓，便把实话告诉了他，说：“我们不是放木排的，是抗日联军。汪亚臣军长为了抗日救国，领导队伍在山沟里打游击，经常和敌人周旋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。我们离不开老百姓，只有依靠群众的支援，我们才能活动开，这些天来，你就给予了很大支援！”杨禄忙说：“就几盒火柴和一碗盐呗，那算什么支援！”抗联战士说：“别看东西不多，可解决了很大问题。”并告诉杨禄：“出来别让坏人看见，免得担嫌疑。”杨禄说：“我往这边来谁也不会怀疑，屯里人都知道我，侍弄完地就钓鱼……。

为了绝对保守秘密，从此以后，他与抗联战士接触十分

谨慎，全村人谁也不知道。有一天，杨禄正在铲地，来两名抗联战士，到地里就帮助干活。休息时，一名战士说：“还得麻烦你，给我们弄点干粮，有的病号好几天没吃到粮食了……”第二天，杨禄借着下地干活的机会，在怀里揣着七、八个苞米面饼子，交给了这两名战士。当时他看到这两名战士也像没吃饭的样子，就叫他们吃，两名战士谁也不肯吃，并说：“回队交上去，分下来才能吃，这是纪律。”这时，杨禄把自己午间准备吃的两个饽饽头拿出来，分给他们一人一个，让了半天，他俩才勉强吃了一个。

此后，抗联战士经常接触杨禄，托他为抗联买东西、了解情况，杨禄成了义务交通员。有一次，抗联战士让他去冲河街给买药和梳头油（擦枪用）。杨禄挑着二十多斤鱼，以进街里卖鱼为掩护，这次很顺利，到街上不久便把鱼卖了，把东西买了回来。只是进城时候被自卫团站岗的勒索去四条大鱼。为了套近乎，杨禄说：“过几天打着鱼再给你们带几条大的。”哪知，第二次上冲河街，到城门就卡住了。自卫团对进城的每个人都进行盘问和搜身检查，因杨禄手拎两条大鱼，送给了哨兵，那个站岗的才把他放了进去，并告诉他说：“办完事赶快出城，过一会儿我就交班了。”杨禄给抗联队伍把东西顺利地卖了回来。

八月的天气，正是烈日炎炎。有一天下午，老杨正在地里拿大草，忽然来了两个身背大枪的抗联战士对他说：“现在有紧急任务，还请你帮忙，我们军长汪亚臣请你”。杨禄放下活随两名战士来到南林边。只见有七、八十名抗联战士，大部分是些精明能干的小伙子，有的拿大枪，身上挎匣子，地上架着机关枪。身材高大、魁梧的汪亚臣掌长紧紧地

住老杨的手说：“你对我们的支援很大，给队伍办了很多事情，我代表全体战士向你表示感谢！今天我们准备攻打冲河街，因道路不熟，还要请你给带路！”杨禄听说要消灭敌人，喜出望外，便忙说：“那太好了，就去呀？”汪亚臣军长说：“不，等天黑以后再攻打，你看从哪边走方便？杨禄说：“跟前的道我都熟悉，咱们从西南角进去，走出林子，过了一个小河沟就到城墙跟前了，我们过去上街时，若从城门进不去，就在那里偷着爬进去！”午夜时，杨禄带路，汪亚臣军长率领战士一举攻进冲河街。他们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，进城就把警察署、自卫团的窝给端了。其他部分的敌人，听见抗联的枪声，吓得乱作一团。日本讨伐队、伪军、森林警察队，谁也不敢出来增援。汪亚臣军长率领战士速战速决，不到两个小时，队伍就出城了。共缴获三十多支大枪，一千多发子弹，还有其它物资。抗联队伍背着胜利品在归途中还听到日本鬼子、伪军乱放枪呢。

敌人遭到抗联袭击的第二天，冲河街的敌人互相谩骂，警察署和自卫团埋怨日、伪军不增援，日伪军骂他们是饭桶。日本鬼子像疯狗似的，下令叫森林警察队搜山抓抗联，并调查与抗联有关人员。森林警察队抓不到抗联，就把经常上山挖药的、采集山果的、刨地和钓鱼的无辜群众当嫌疑分子抓来进行迫害。杨禄也被抓去，说他是通匪的政治犯。第一次审讯时，有一个伪警察问他：“抗联打冲河街，是你给拉的道吧？”老杨坚定地回答：“不是，打冲河街那天，我有病，好几天没出屋了。”一个警察又问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老杨说：“不知道！”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警察帮腔说：“不用你嘴硬，到地方你就承认了，”

第二天把杨禄五花大绑，用警察押着，当政治犯送到五常县警务科关在监狱里。以后，对他审讯二十多次，每次都叫他承认给抗联拉道打冲河街，不承认就动刑，上大挂、皮鞭抽、灌辣椒水、压杠子、垫砖头、过电……各种残酷的刑罚都使过。杨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有一次，他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昏了过去。警察用冷水浇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。

有一天，一位难友悄悄地对他说：“你的案情不承认有活路，若承认就没命了！”杨禄自己想：真是这样，若承认，酷刑不是白挨了吗？看样子，这些警察狗子也没抓到什么证据。于是，下定决心，以后再审讯时，每次都说不知道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警务科经过数次审讯，始终问不出什么，共把他押了八个多月，第二年春才被释放。

杨禄被送到警务科后，乡亲们都为他担心，人人都说那是九死一生的地方，杨禄怕是回不来了！大家听说老杨被放回来，都高兴地去看望他。乡亲们问：“你到底给没给拉道？”他说：“从来没有此事，白蹲笆篱子！”可他自己心里明白。直到1945年东北光复以后，为此事不用提心吊胆了。

1952年，中央指示各级政府派员到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对抗联有功人员。村政府向上级反映杨禄对抗联有过贡献。但他始终不讲自己曾为抗联做过什么事情。当时他想，伪满时受了那么多折磨也没承认为抗联拉道，这回有了荣誉就承认，那多不好啊！村干部动员几次，他都不肯说。后来，知情人张福证实说：“你给抗联拉道打冲河街那天，你在地里拿大草，我趟最后一遍地，你在林子那边，我在这边，抗联战士没看见我，我看见他们了，他们找你，你二话没说就

跟着去了……。”这时，杨禄才把全部过程说出来，特别是他在敌人监狱里，坚贞不屈、守口如瓶，使人们格外敬佩他，爱戴他。

（根据冲河镇小黑河村刘全才、张福二人口述整理）